专刊

总第 88 期

2021 年第 10 期

2022 年 1 月 15 日

信息资料 欢迎交换 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

高质量发展与智库建设研讨会
暨庆祝马洪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活动

编者按：12 月 5 日，由马洪基金会主办的“高质量发展与智库建设研讨会暨庆祝马洪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活动”在银湖 CDI 大厦隆重举行。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邵汉青，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常务副主任高振怀，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吴定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理事长郭万达，马洪基金会理事、名誉理事、智库百人会众多智者、深圳各界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代表以及多家主流新闻媒体，以线上+线下双渠道共同参与和见证此次活动。

2011 年，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成立。这十年马洪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产出了众多的成果，马洪同志的精神火种依然在传递、传承与传播。现将高质量发展与智库建设研讨会嘉宾发言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主要观点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寰球视野谋改革 更启新程奏凯歌

十年前，为纪念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我国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马洪同志，综合开发研究院发起成立了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的成立，在于继承和发扬马洪同志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的宝贵精神，弘扬老一辈爱国爱民的崇高风范，为党和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十年来，马洪基金会在创会理事长李罗力同志的领导下，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打造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智库品牌，探索了一条民间智库参与决策、服务社会的有效路径，为深圳经济特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推动政府政务公开、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马洪基金会过去十年工作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问势寰宇，服务社会

马洪基金会紧扣国际形势、国家发展、社会改革，及时对影响国内外经济发展、政策走向的大事件进行宏观分析与趋势研判，引导社会正向讨论。每年，马洪基金会都会举办“问势系列”报告会、“春·秋”理事报告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名誉理事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这些高端学术报告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同时也把有关研讨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主动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评议改革，服务政府

马洪基金会作为民间智库，主动发挥社会第三方监督政府、服务政府的作用，推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马洪基金会开创性地举办了“金秤砣”评议活动，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如财政预算、政务公开、五年规划、社会治理、疫情防控、营商环境等重要事项设计指标体系，通过网站采集、政府信息申请、企业调查、专家座谈、市民访谈等方式获取信息、研究问题，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八年来，“金秤砣”评议活动以深圳为起点，走向全国，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汇集民智，服务决策

马洪基金会发挥桥梁作用，汇集社会各界的智力资源，发起成立了智库百人会，这里面既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又有社会各界的智者贤达，他们是现行体制和政策的最直接关联者。通过智库百人会，他们的意见能够让社会公众、媒体及决策者知晓，成为丰富决策思维的一股重要的正能量，也不断为智库建设做好专家和人才储备。可以说，智库百人会进一步推动和扩大了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度，让更多人参与到改革和政府的决策当中。

马洪基金会取得这些成就，离不开马洪同志的光辉垂范，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尤其离不开创会理事长李罗力同志的坚持坚守和开拓创新。一直以来，李罗力同志以一位共产党员的情怀，铭记初心和使命，把马洪基金会这份崇高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在创办初期建章立制，在发展阶段谋划发展，亲力亲为，满腔热情地在基层进行改革尝试和实践探索，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进步。为落实国家“大改革”、“宏观改革”的顶层设计，罗力同志提出“小改革”、“微改革”的理念，基金会着重推进基层的改革，民生微改革，社区治理改革，这些“小改革”长期坚持，久久为功，就会形成积小成大的“涓滴效应”。

当前，全国正在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马洪基金会在未来的工作和发展中，要永远保持初心，心系人民，服务政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特色、有价值的“智库产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深圳双区建设、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引用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中国体改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同志专门为庆祝马洪基金会十周年所作的题词为结束语，与大家共勉：“评深圳，论全国。寰球视野谋改革，回眸十载辉煌路，更启新程奏凯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洪基金会理事刘世锦——

摸石头度过高质量发展之河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祝贺马洪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间，基金会在深圳这片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热土上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马洪同志所倡导的学风、作风，虽然基金会处在发展的起步期，规模不算很大，但还是做了相当多有情怀、有价值、有特色、有创新性的工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金秤砣”政府信息公开评议工作，我也参加过几次。这件事情有一定开创意义的，当然也是有难度的，开始的时候有些地方政府并不太重视，但是我们的工作很认真，地方政府也不得不逐步认真起来。应该说这件事对于推动地方政府促进信息公开、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件事情坚持多年能够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基金会立足深圳，搭建平台，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和活动，我也经常看咱们的工作简报，最近几期简报中讲到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深港口岸经济带的发展、创新创业培训等工作，对于推动深圳相关方面的工作很有积极作用。

最近几年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发展很快，数量大量增加，相互之间竞争也相当激烈，所以对于我们基金会来讲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如何能够应对挑战，抓住用好机遇。

就基金会的发展来讲，现在大体上可以看到两种类型比较多，一种是研究型的，主要是提高研究水平，聚集人才，选准题目，出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扩大社会影响力。另一种是活动型，主要是搭建平台，连接和组合相关各类社会资源，搞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或者开展社会实验，对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起到示范引领、实际推动的作用。我们也看到有些基金会是两种方式并存的，同时发展，形成一种比较好的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效应。

从深圳来讲，现在仍然是改革开放创新的前沿，中央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所以推动深圳和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创新驱动高水平开放，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发展，都需要在深层的体制性、结构性改革上有大的突破，也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我听有些同志讲改革开放已经 40 多年了，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吗？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过的河和 40 年前、和以后很多年过的河不一样。比如说当初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过的河是怎么搞好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办特区，现在是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条新河，还是要过的，这样就需要先行先试，多做一些自选动作，多做一些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工作，这方面应该说基金会这一类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像前面提到的“金秤砣”评议活动就是这种特点的工作。深圳的社会组织有必要也有条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在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方面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还有一个方面是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应该更加重视基金会、智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在资金筹措和人才聚集方面创造有利条件，给予更多支持。

我们相信下一步马洪基金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不忘初心，继往开来，齐心协力，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在深圳和全国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开拓性、建设性作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樊 纲 ——

分析真问题，面对真挑战

当罗力说要退休可能就是又要创造其他新的东西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使人健康，你看罗力多健康，充满活力，不断想新的事情，做新的努力，使生命更有价值。　一方面祝贺马洪基金会成立十周年，一方面也是表示学习，多年前罗力当秘书长时，我参加过全球论坛，把戈尔请来，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罗力能把它做成，确实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创造的精神，我们办智库、办研究院，仍然要发挥这样的精神，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一点，从马洪基金会的成功当中学习创新的精神，这也是这个时代要求的，大变局下如何创新、如何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道路，这都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并且努力做到的。

接下来我想就智库讲四个方面的关系，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一、智库与科研的关系。智库这种机构与科研院所、科研机构之间的差异、关系。科学研究机构是就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不一定创造出实践的成果，不一定创造出直接可以应用的技术，但是要在理论、基本规律、逻辑上做深入研究。智库首先是综合性，不是研究某一方面的事情、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里要讲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跟智库的关系，早年我在社科院，在北大教书，这些都是学术机构，你不能指望学术机构做咨询，去解决现实问题。学术机构研究基本规律，研究基础性知识、逻辑。智库要解决现实问题，以理论为基础，把多方面的理论综合起来，共同在一个系统的格局下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智库做的事情，首先是学习理论。要有理论，你得有知识，得懂得基础逻辑，但是又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你必须运用各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接地气地调查各种问题，根据你所调查的实际问题，运用理论分析，综合思考一些解决方案，这是咨询机构、智库所要做的事情。综合开发研究院、马洪基金会都属于这一类机构，具有综合性、实践性，要落地。在现实当中，我们也看到有

些科研机构给政府咨询、搞战略规划，但不见得有优势，因为他们很专，基础性很强，不一定了解实际情况，不一定能够综合其他知识共同解决实践性的问题，反倒是我们这些智库在做地方咨询时有优势。这也提示我们得学理论、得学基础知识，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研究。

二、政策研究与企业咨询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院有特色的地方，我们一方面给政府做政策咨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地区、各省的地方政府都要做政策咨询，同时也给企业做一些咨询。因此，政策研究和咨询性的研究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不做政策研究，不了解现实情况，不了解政府各种政策的来龙去脉，就无法给企业、给地方政府做咨询。对于我们这样的智库而言，要做研究，往往不是做基础性理论研究，而是在理论基础上做政策研究，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为企业做各方面的咨询，特别是政策咨询。

从 2015 年批准的 25 家全国高端智库情况来看，我们确实具有独特之处，很多机构比如社科院、中科院是基础理论加决策研究，我们是政策研究加企业咨询，这个特点使我们能从企业研究、企业咨询中获得资金，来支持政策研究。大家一说建智库，就说到兰德公司，综合开发研究院在 25 家当中更像兰德公司，财务可以独立，可以通过给企业的咨询获得财务独立，做更深入的政策研究，兰德公司的特点，首先是一个咨询公司，大家老是看到他给美国国防部做研究，其实他们做各方面的企业咨询，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做更好的政策咨询，两方面结合得好也是智库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

三、地方机构和全国问题的关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一开始就立足深圳、服务全国、放眼世界。以前我们在北京做研究时总有一种感触，上海的经济学家怎么就不研究宏观经济问题，都研究上海经济问题？美国的一个小地方、山沟里一个学校的教授可以研究全球的宏观经济问题。除了机构资金来源、跟地方政府的关系等等，我们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是为地方政府做政策研究、政策咨询，另一方面是从地方的局部经验和案例中发现全国性的问题，这是不在北京的研究机构特点所在，也是优势所在。有地方经验，同时有全国的视角，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具有价值的特点。一方面研究现实的、地方的局部问题，另一方

面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全国的发展，刚才刘世锦讲全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就在摸石头的过程中，如何从深圳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对全国有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提出解决全国性问题的方案，这是我们的优点，是我们的特点。从地区放眼全国，也是所有智库应该发挥的重要方面。

马洪基金会的“金秤砣”评议活动先从深圳开始的。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体制当中这个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再把它放到全国，发现这的确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于是做了全国的“金秤砣”活动，这非常重要。我们作为深圳的一个机构敢于评价全国的省政府，给各个省打电话要数据，起到了推动全国体制改革的作用。我们要立足当地、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世界的事情，比如“一带一路”、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大变局下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我们在深圳直接体会到这些事情，粤海街道那些企业在“白名单”上有多少家，直接调研这些企业，就知道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对策，这就是我们立足地方、面向全国的重要优势。

四、政府和民间的关系。25 家高端智库，绝大多数是政府的，10 家大政府的，包括党校、新华社，还有 10 几家是学校的，也有政府的，真正的社会智库只有两家，一个是国际交流中心，一个是综合开发研究院。国际交流中心是曾培炎副总理做的，政府官员比较多。综合开发研究院比较独特，历来有官方背景，是事业单位，从马洪同志、李灏同志开始，后来是锦华同志，一直要求我们向市场体制过渡，一方面我们有政府编制，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员工已经市场化聘用。

马洪基金会更加民间化，更加是民间的智库机构。今后智库的发展方向也应该是民间智库机构获得更大的发展，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具有更敏锐的视角，可以更加深入地分析现在社会和经济各方面面临的各种问题。政府的研究机构仍然有用，仍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我们这样的体制也需要政府的机构，我们现在研究的政策都是公共品，政府也需要做这方面的事情，但也需要更多

民间机构的发展，像马洪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也是发展方向。

民间机构要发展，智库机构要发展，就特别需要企业的帮助、企业的支持，所以今天向企业致敬、感谢企业非常重要，我在北京搞过改革基金会，也是企业资助。前些日子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之后，文件里讲到第三次分配，弄得中国的两大互联网巨头马上一人掏出 1500 亿搞捐助。今天不讲共同富裕的话题，共同富裕首先是一次分配，没有一次分配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二次分配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三次分配实际上主要是自愿的、慈善性的捐赠，它不解决基本的分配关系问题，但是它解决资金应用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需要，比如特殊病患、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照顾，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比如教育、科研需要资金的支持，需要慈善性的捐助。有一个关于马斯克的故事，联合国官员说马斯克交出 60 亿美金就可以解决全世界的贫困和饥饿问题，马斯克说“能解决吗？”他的质疑是因为要用机制。有些事情可以靠捐赠解决，但如果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可能靠基金会、靠捐赠解决，而要机制、体制。智库发展就是企业捐赠能够帮助解决的领域。通过这个会、通过这次活动，希望更多企业家关注智库的发展，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相信智库的发展也会对企业的发展做出回馈，支持企业的发展。

再次祝贺马洪基金会十年的成功，再次感谢罗力创会理事长的贡献。谢谢大家！

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洪基金会理事 唐 杰——

躬耕于实践，汇聚于探索

首先汇总一下过去十年有关增长和创新领域取得的新的进展，我把它简称为 H-B-S 模型，H 模型讨论了经济发展从简单产品/简单技术到复杂产品/复杂技术及多学科融合过程。B 模型讨论了技术空间与产品空间的相关性问题，更多的

相关问题和相关技术带来了更加复杂的新兴技术，形成了新兴产业崛起。S 模型则是讨论网络的重要性，一个企业裂变成多个企业，构成新兴行业的分工网络，一个企业与多个企业具有复杂的相互投资关系构成了城市产业多样化推动的一波又一波的成长过程。

下图显示，劳动密集型时代，产品技术均简单，降低贸易成本最重要，进入资本密集型时代，复杂程度增加，政府具有了产品、技术和产业选择的必要性和认知能力。从图中可以看出，围绕核心技术与产业形成日益复杂产业集群过程，产业与技术更加复杂，政府的选择性就会因不可预知风险加大而减弱，转而实施更加广泛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政策。

比如 2013-2015 年的实际调查中，深圳的产业就是围绕着 ICT 硬件和数字经济的软件构成城市核心技术，演化成复杂的城市技术。右图是美国的技术，围绕不同产业，构成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一个产业能够汇聚出更多更复杂的产业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变化，2005-2017 年这 12 年间，中国各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总量快速成长，与此同时，科学论文的含量也在快速成长。总量的成长、论文的成长成为专利和论文、专利和专利之间相互融合，构成一个复杂性的过程。

右图显示了企业和企业之间是不是裂变出很多企业呢？它是不是具有复杂性、相关性？是不是可以构成企业之间的网络？我们做百家中小企业调查，可以看出三年里有供应商的企业和没有供应商的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供应商的企业从 30%降到 20%，有供应商的企业从 63%增长到 77%，这反映出企业之间的相互分工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另外一个事实，深圳的中小企业，以深圳之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作为供应商，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创新专利论文发表的过程和一个城市成为核心创新城市的过程，深圳更多是创新，周边是以制造作为深圳的配套。

谁的技术越复杂，显然需要的知识含量就越多，知识含量越多，定价权越

高，被别人复制、仿制的可能性越低。在这个过程中，从复杂性的排名来看，深圳排名第一，从数据排名看，北京是第一，京沪深作为重要的创新型城市，复杂性极高。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复杂性可以看到城市创新的关系。

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和产品复杂变化的过程，技术含量越高，越复杂，GDP 越高，深圳的启动就是靠劳动密集型生产大批量简单产品，当年做箱包、做鞋、做服装，只要便宜，只要“七通一平”，有投资优惠、有招商引资，就可以大规模生产。进入第二个阶段之后可以看到资本密集型在深圳的发展，深圳不再生产箱包，深圳“三来一补”的产业慢慢变成规模化制造业，传统的简单化产品，箱包、服装等从深圳退出，深圳变成全球 IT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在这样的制造中心，工业化的规模收入很突出，如何创造规模收益变成政府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当时的金融创新是要支持工业化。

当深圳走向新的阶段，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性慢慢下降，转而成为科学引领、产业细分、创新能力，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我们把这些词跟相关网络放在一起就是高迭代，快速迭代，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的过程，它变成深圳未来走向新的创新方式。在这样的创新方式下，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一代、二代、三代创业企业家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企业家从科学切入，在科学、设计、开发与周边的大规模制造融合，深圳快速走向创新复合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工作看起来不再是万人大厂、十万人大厂，更多是不断产生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带动城市在科学创新道路上进一步提高，我们可以看到 80 后、90 后、00 后新一代企业家通过科学引领产生新一代创新。

深圳市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 吴定海 ——

在高质量发展与智库建设研讨会暨马洪基金会十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大家下午好！首先，我谨代表深圳市社科联，向出席今天高质量发展与智库建设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成立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智库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部署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些都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目标。

作为深圳市社会科学类社会组织之一，十年来，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依托国内一流专家资源，构建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马洪智库”。马洪基金会是国内唯一的一家通过民间公开评议活动对政府进行第三方评价的机构，创办了新型“智者”公益平台——“深圳市智库百人会”，承办了“城市发展与金融创新”“建设先行示范区”等高端学术研讨会。经过十年的发展，马洪基金会荣获了“全国先进社科组织”“5A 级社会组织”“红旗党支部”等诸多荣誉，2021 年被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认定为“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这些荣誉的取得都是对马洪基金会过去十年工作的充分肯定。

11 月 8 日至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推动高质量

发展”列入十个“明确”之中，系统概括了高质量发展问题，界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完整要义，提出与高质量发展紧密关联的若干区域战略部署，其中就包括“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决议》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强调“五个必须”，指出必须明确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等。由此可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的重要要求，应贯穿到新征程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当前，深圳正相继迎来“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改”示范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机遇。争当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示范者、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已成为深圳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为此，深圳迫切需要加强智慧科学决策指引，迫切需要更多新型高端智库为城市决策和治理提供咨政建言、理论创新等高水平服务。深圳智库应锚定目标，从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主线，在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等领域持续深入探索和研究，努力产出能落地能转化，进而有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优质成果，为深圳新时代改革发展贡献磅礴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大智力支持！

希望马洪基金会充分发挥新型智库的平台优势，立足中国国情和深圳市情，深入调研，把握规律，做深做实理论研究，做大做强咨询服务，承办好各类社科活动，不断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力争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和全国各地提供可供参考、借鉴和复制的深圳智库样本，为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贡献深圳智库力量！

深圳市决咨委专职常务副主任、深圳市智库联盟理事长 高振怀——

深圳新型智库建设的文化和灵魂

很荣幸参加马洪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活动。马洪先生为我们国家智库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永远铭记。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智库发展进入全新时期。

近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我市智库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开发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深圳智库发展水平与深圳城市地位不匹配，亟需跨越式发展，而实现跨越式发展非常重要、甚至核心的因素，就是塑造深圳新型智库独特的文化和灵魂。

一、学术底蕴

智库肩负着开启民智，建设学术社会的重任。严复提出建学术社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众多领袖们的执着追求。蔡元培塑造了北大的独特文化，完成了北大学术社群的建设，使北大成为学术社会的一个缩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何强调学术社会？他们认为真正的学术一时看起来似乎无用，但是长远看最有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就是以更根本的方式与西方竞争。

学术和决策咨询是共生体，具有紧密的关联度。智库离不开学术理论支撑，唯有学术的持续积累，智库才能厚积薄发。要做好智库，首先要做好学术学问。一是学术与咨询如同根和叶的关系，根深才能叶茂；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无理论支撑的智库，咨询研究就不会有内涵有深度。学术能涵养决策咨询，学术的深度决定决策咨询的深度。如果一个智库专家缺失学术素质和学养积淀，一定不能成为优秀的智库专家。二是学术研究能促进智库不仅提供具体

问题的应对之策，更能提供智慧。智库的智慧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决策者就是通过把握规律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智慧，这个东西无形却有价值。三是学术能使智库提供观察问题的专家视角。从学者到智库专家，在于以其专业能力提供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全新视角，而这个全新视角将会为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对策。

二、思想深度

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用“思想工厂”定义智库，这告诉我们智库必须有思想，而且是深度的思想。

智库必须打造以独立思考为核心的科学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是智库人的基本能力建设。智库人要成为真正的思想者，追求思想的精深，必须摆脱平庸和功利。叔本华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真正的思想者在灵魂深处一定是孤独的。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生活是人身上最接近神的部分”，我们要有古人看重的“孤往”精神，永远追求做思想者。思想深度还体现在决策咨询要做到大道至简揭示本质。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必须拨云见日般地提出真知灼见，体现最本质的东西。假话、空话、套话、大话，跟真理毫无关系。

智库必须具备创新能力。智库不能做仅仅停留在政策解读层面的智库；不能做简单揣度决策偏好的智库，一旦迎合和揣摩，智库专家就会变成逐利性政策咨询专家，而永无创新；智库要聚焦前瞻和原创，坚持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不断强化“精、专、深、透”的研究理念。

打造智库思想生态。有学者提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没有产生过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统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思想生态，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没有了思想生态。智库建设，要打造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思想生态：一是研究问题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不同的学术观点、政策建议，切磋争鸣要成为常态。二是鼓励对相同议题进行多个智库并行论证、多元论证，包括逆向论证，开放和探索应成

为风气。

三、理性精神

理性的哲学解读是对感觉不信任，其本质是科学。沉思优于轻信，逻辑优于偏好，证明优于解释，理性优于感性。

必须尊崇规律、恪守规律。如何避免决策被局部和眼前利益甚至被伪科学所蒙蔽扭曲？归根结底就是尊崇规律、恪守规律。比如如何处理好创新弯道超车与脚踏实地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与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研判，制定相关政策。

要具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智慧，居安思危是历史昭示的一条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能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当前，一些智库非理性的乐观偏误绝对不能忽视。智库必须关注现实，心存忧患，才能够清醒地认知、应对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要具备反思能力。恩格斯讲“只有人类才具备反思的理性能力”，智库更加需要具备反思的理性能力。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1 年来，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在这其中，智库有很多课题可以进行研究。比如，深圳为什么成功？它的独特基因、城市气质到底是什么？理性总结、反思够不够？深圳创市之初，那种激情、情怀、理想、格局，那种敢闯敢试、敢冒险、敢为天下先，那种多元、开放、包容，那种回避平庸而追求卓越，如何赓续？智库应该在这些方面咨政建言。反思的意义不在于回忆过去，而在于当下和未来。

四、现实品格

要具备问题导向的品格。智库要将发现问题、聚焦问题，作为工作常态。智库人要有敏锐的洞察现实重大问题、现实走向的能力，永远与现实保持最紧密关联度，最忌脱节，落脚点要在现实上。

要具备建设性的品格。以科学资政服务于科学执政，前瞻性、战略性与操作性高度统一。智库产品的归宿是转化，智库必须懂决策。要进一步完善“旋转门”机制，促进智库专家去决策部门挂职。智库要以多样性、多元性智慧提供多样决策选择，而不是单一产品供给。

要具备可持续性的品格。建设性品格是指我们的咨政建言要管用，可持续性的品格是指智库的成果转化之后要长期管用，能经得起考量和时间检验。

深圳新型智库要以学术底蕴、思想深度、理性精神、现实品格，成为政府离不开的科学资政思想库。智库要以做到政府“离不开”、“完成影子政府的角色塑造”作为价值追求，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智库独特的文化和灵魂，这是深圳新型智库的“库格”。只要我们钟情于智库事业，投入精力、投入情感，我们一定能在矢志不渝的追求之下实现深圳新型智库的跨越式发展。

根据国务院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规定，营商环境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在针对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主体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等方面，却忽略了企业稳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高素质人才。缺乏良好的人才引进与留下机制，企业的创新及持续发展将面临难以为续的窘境。

在企业自身通过各种激励方式创造有利于人才施展所能的发展空间以外，政府构建吸引高素质人才踊跃创业及安心居住的人才环境，解决人才长期发展所面临的居住、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吸引人才及留下人才。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亦是促进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 2014 年《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工作实施办法》出台后，便利的落户政策和人才补贴成为大学毕业生选择城市的重要因素，“十三五期间”深圳引进人才 120 万人，但能否将人才留下，留下的人才能否为城市注入创新创业的活力，恐怕不是一个落户政策和人才补贴可以解决的。况且从 2021 年 9 月起，深圳对新引进的人才不再受理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原有的人才补贴政策的优势不再。

因此，人才环境的构建不能仅靠短期的补贴政策吸引人才，增加优质经济的人才租赁房屋供给、设置更为便利的人才落户条件、创造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推动医疗资源的发展、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综合完善可持续性的人才环境，降低人才居住成本、教育成本和养老成本，才能真正让人才放心留、长久留。

南方科技大学思政中心教授、马洪基金会监事 乐 正——

“双链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 40 年来，深圳市率先加入全球产业链条，中国加入世界产业链条，一开始全球并不在意，后来一些国家开始恐慌，觉得原有秩序会造成混乱。2001 年以后，在我们已经进入的全球产业链条里，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在部分个别领域挤进全球创新链条，全球的产业链条和全球的创新链条这两个链条相关，但是不一样，差别非常大。

大家回顾一下，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一百年前就加入了全球产业链条，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加入全球创新链条，这种例子非常多，比如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土耳其的工业化已经一百多年，到今天仍然是全球创新链条的“门外汉”。但是中国不同，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加入了全球产业链条，现在又在个别领域挤入全球创新链条。这种趋势也让西方大国将国际产业“微笑曲线”的历史格局做了一些大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说中国破坏了秩序，他们认为国际微笑曲线有一个固定的格局，在下面的就老老实实在下面待着，上面两个点是欧美的。但是中国现在是要快速往上走，美国就不高兴了。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产业链条的时间比我们更长，他们作为世界小工厂的历史比我们更长，但是由于他们在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品牌建设方面严重不足，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加入全球创新链，无法实现产业链

和创新链双链融合、交融发展，始终无法实现产业链的现代化，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如果没有加入全球创新链条的话，基本就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网上对联想议论比较多，其他问题我不讲，但联想有一个问题让我有点失望，它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条非常重要的一员，但目前为止在全球创新链条中没有地位，它有自己的品牌，但是没有自己的技术。本来联想在国内最有资格把产业链和创新链结合在一起，因为你是中科院出身，是计算机所出身，你不搞研发，谁搞研发？但是迄今为止，联想在创新链方面没有建树，跟富士康唯一的差别就是联想有自有品牌，富士康没有自有品牌。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向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了全球产业链，不管是做电脑、手机还是汽车，遍布全世界，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你愿意做，有条件，都让你做，但是至今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创新链条。目前全世界的技术贸易 80%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不到 10%，这是现实，而中国要改变这一现实，美国非常不高兴。在美国的鹰派看来，中国可以有很多富士康，也可以有很多联想、OPPO、VIVO，但是你们不应该有华为，永远不应该有华为，华为就是不老老实实在“微笑曲线”下面待着，而是要往上面走，这破坏了规矩。所以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进行一系列全球创新链的拆链、毁链行为，针对谁，大家都非常清楚。

前财政部长鲍尔森今年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中国跟美国谈判，而且这个谈判必须对中国有利的话，就是中国必须公开承诺绝不在高科领域挑战美国。中国必须有这个承诺，美国才能放你一马，否则必须在技术端和市场端双链封杀中国。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是公开讲的。

未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链”融合发展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十四五”期间我们应该致力于打造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共生的价值链体系，提升中国产业现代化水平。

“以创新链引领产业链，以产业链支撑创新链”这是总书记去年 10 月 24 日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是对深圳发展提出的要求，认为深圳有条件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十四五”开局应该选准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做“双链”融合的事情，选准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城市来做“双链”融合的事情。

我想提一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最近都注意到了，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爆炸性增长，比亚迪去年是 19 万辆，今年估计可能会达到将近 60 万辆，不是一年增长几十，是增长百分之几百，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在燃油汽车领域，中国跟奔驰、宝马、丰田相比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追赶，但在新能源车方面，我们的步伐非常快。车企市值，特斯拉全球第一，丰田全球第二，第三是比亚迪，奔驰、宝马、大众都在后面。跟传统汽车比，比亚迪是上汽集团 3.5 倍，是东风汽车的 63 倍，比亚迪才做了几天汽车啊？充其量是少年大学生，人家已经是博士后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某种意义上有其必然，从宏观来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产能已经连续六年排世界第一位，燃油车我们跟奔驰、宝马差距比较远，但是新能源车，我们已经把他们甩在后面，甩丰田是分分钟的事情，就像当年华为紧逼爱立信一样，比亚迪紧逼特斯拉很快将成为现实。

这个奇迹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目前比亚迪每个月新能源汽车销量都在增长，每个月都在历史性突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的目标可能提前实现。我认为这是产业链和创新链结合在一起比较成功的领域，汽车的产业链条比较长，比 IT 产业链更长，如果在这个领域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认为很快会弯道汽车，中国在汽车领域弯道超车有可能在新能源领域突破。宁德的锂电池已占全球市场的 24%，遥遥领先，中国汽车电池占全球 70%的产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方面，虽然特斯拉卖得比比亚迪贵，但是技术创新特斯拉远远不如比亚迪，大家可以查一查资料，真正的技术掌握在比亚迪手里，特斯拉只是做了一个平台，特斯拉做汽车有点像宝马，比亚迪做汽车有点像奔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深圳应为中国“双链融合”发展方面为国家探路，看全世界，“双链聚合”形成优势的城市并不多，有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创新链很强大，但是已经没有产业链了，包括美国的很多城市已经没有了产业链，有些城市有产业链，又没有创新链，二者兼而有之的城市，全世界屈指可数，深圳有幸成为其中之一，特别是 IT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我认为华为是深圳乃至中国把“双链”融合做成标杆的企业，不管产业链还是创新链，都融合得最好，不管是第三产业还是第二产业，或者 2.5 产业，它都已经一体化了，在这方面，它确实是我们的标杆。

未来深圳推进“双链融合”发展可能会形成四条主线：

一是传统新一代信息技术，IT 业，仍然是深圳主打。

二是新能源汽车，比亚迪在电池领域已具备 100%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形成了完整的电池产业链。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改变了整个行业对于磷酸铁锂电池的认知，让这种形式的动力电池占据了市场主流。比亚迪目前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厂商，也是全球唯一一家掌握电机、电池和电控全产业链核心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特斯拉的技术路线是做平台，原配件 70%是中国的企业为他做的，而比亚迪不仅自有品牌，还是自有技术。

今年比亚迪销量爆炸性增长，这是 10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亚迪已经跨越了特斯拉，利润率跟特斯拉还差很远，品牌效应不如特斯拉，但在创新和产业链的匹配上已经超过了特斯拉。

这是 12 月 3 日官方公布的数据，10 月份卖了 8 万辆，11 月份卖了 9 万辆，今年可能接近 60 万辆，而去年只有不到 20 万辆。爆炸性增长不是市场突然开辟了多少，而是建立在自有技术之上，我认为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比亚迪可能会打造成一个新的标杆企业，它会不会成为汽车行业的华为呢？我们可以期待。

我非常同意常教授和金教授提出的碳交易、数据交易，最近两天我感觉有一点不是滋味，有两个信息对我有一点刺激。前不久北京数据交易所开张，前天上海数据交易所开张，我跟北大的一位教授两年前就建议，深圳能不能搞一个数据资产交易所，因为深圳有中国乃至世界级的数据大户，我们的市场条件更好，碳交易和数据交易是新的要素市场，深圳应该把 1988 年搞深交所的干劲拿出来，但是现在北京、上海的数据交易所已经开张了。我认为深圳还是应该继续做，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国际规则，谁先做起来，谁就树立了国际规则。不管是产权交易、碳交易还是数据交易，很多方面我们都是当别人的小学生，但在数据资产交易方面也不排除我们能先行一步，虽然特区立法已经有数据条例，但是还可以进一步实操，利用深圳的市场条件和数据大户的产业资源来做深圳的数据资产交易所，为未来深圳“双链”融合发展创造一个新的战略性平台，深交所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平台，数据资产交易所是一个新的战略性平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常修泽——

提供第四条路径选择——用广义产权机制减碳（绿色行动的理论探讨）

参加马洪基金会十周年学术活动，很开心，我前天做了“核酸”来，今天上午做了“核酸”明天回，虽然很麻烦，也很辛苦，但是我感到很“值”。

一、参会的三点感悟

刚才听了马洪基金会十年的活动介绍，很有感触，脑海里形成三点感悟：

第一点，是关于朋友的——“人生自有真情在”。我与咱们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教授、现任理事长郭万达教授、上一位报告人唐杰教授，下一位报告人金岩石教授，八十年代都同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同事 ，在一起度

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并且，有幸与罗力、岩石（还有远在加拿大的杜厦），“南开四人”同上莫干山，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1984 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莫干山会议）”。在奋斗中结下的友谊， 情深谊长。

第二点，是关于深圳的：“这就是深圳！”——1980 年代初，深圳（特别是蛇口）曾在计划经济的重重包围中，为国家改革“杀出来一条血路”。我当年调研后写了篇《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把蛇口的探索——“社会主义十商品经济”体制称之为“中国的试管婴儿”，并带上莫干山。37 年后的今天，虽然受大环境影响，深圳也遇一些阻力，但总体看，社会仍具 " 活力”。马洪基金会组织的“民间评议政府”就是一例，虽有局限，但有新意，盼望能向深度进军 。

第三点，是关于中国智库的。前面有朋友讲了智库应该“独立思考”，提供外脑，我有同感。我在出版的《学术自传》扉页曾写过两句鞭策自己：“宣传是传播已知，科研是探索未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之《常修泽学术自传》，广东经济出版社，2020 年 11 月版） 。马洪基金会有活力，是什么力？难得的“创新力”。我体悟：现在国家一些智库，可能正处于“传播已知”与“探索未知”的历史性角力过程中。

二、第四条路径选择：问题的提出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提供第四条路径选择：用广义产权机制减碳》，面对人类环境危机，讲一下自己的理论观点。

我在 2009 年出了一本专著，叫《广义产权论》 。针对多年产权多集中到物权、债权、股权等“狭义产权”层面，书中提出，产权应该拓展到“广义”层面。今天我们探讨减碳问题，可以把《广义产权论》作为其中一条路径（会后我把书赠给马洪会） 。（ 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年 9 月版）

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减碳或者绿色发展路线，有三条：一通过技术手段来减碳；二通过结构调整来减碳；三通过政府规制来减碳。其中，政府规制路线人们更熟悉，如开征环境税、环境巡视组，以及拉闸限电等。

我现在提供的是第四条路线，即用“广义产权”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1978 年底三中全会一开过，我入南开经济所搞理论研究，谷书堂老师告诉我“改革就是给每个人身上安马达”，对我思想影响较深。

国内的生态问题主要是：“天”，污染比较严重；地”，资源耗费过度；“人”，环境人权淡泊。针对此，在《广义产权论》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 2011 年，我发表了论文《天地人产权论》（常修泽《天地人产权论》，《上海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新华文摘》2011 年第 17 期），进而提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旨在为这一生命共同体“立命”（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上海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

2021 年 4 月，中国领导人在世界气候领导人峰会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叫做“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高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天地人生命共同体”是调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上个月（2021 年 11 月）在世界气候大会上，就在中美关系最紧张时一个转机出现了，11 月 10 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中美两个大国终于坐下来，签定了关于应对气候问题的联合声明，事情有了转机。

拙著《广义产权论》及其随之提出的“天地人生命共同体”，为“碳中和”和绿色行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三、《广义产权论》三大要义：新路径的理论奥秘

《广义产权论》这本书 43 万字，核心是三大要义，9 个字：“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第一要义，“广领域”，广到天、地、人。

——广到“天”，即环境产权。我在 2004 年写了一篇论文叫《论环境产权》，当时有关同志说“天上哪里有产权？你别异想天开”。我的看法是，天上“碳”（以及甲烷等）的排放权问题，长期以来确实不是商品，也没有产权关系，但自京都议定书签订后，由于各国要分摊碳排放指标，此领域就有新变化、新情况。没有指标时是一种格局，有了指标认识也要跟着变化。

“碳”——从非商品向商品转变，从非资产向资产转变，从非产权关系向有产权关系转变，这是我们讨论“碳中和”的理论支撑。因为它是一个商品，因为它是资产的一部分，因为它有产权关系，所以我们想要用产权来调节它。该补偿的补偿，该赔偿就赔偿，这是利益关系，也是产权关系。

运用“天”上的环境产权机制，说到底，一是要协调环境创造者与环境受益者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从负能量的角度，调节环境的损害者与环境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我从人本经济学研究，绿水青山既是“金山银山”，更是“环境人权”，既然是环境人权，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受了损失的，就要相应补偿。谁使环境人权受到损失，就是环境的破坏者，就要做出相应的补偿。产权关系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环境的补偿和赔偿问题。所以，环境的创造者应该得到报酬，谁创造，谁得益；谁破坏，谁赔偿，这就是我说的看不见的手——“产权机制”。

——广到“地”，就是资源产权。每种资源都有产权。人类有十多种资源，最近国务院向人大汇报，人大的老同志提出汇报的资源还不够，例如“太阳能也是国家资源”等。现在正在拓展研究。减碳的重要方面，一是环境，环境要保护；二是资源，资源要节约；还有人本，人本要创造。

——广到“人”，就是“人本产权”，主要有四大类产权：一是劳动力产权；二是知识产权（侧重基础层面）；三是技术产权（侧重应用层面）；四是管理产权。202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意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大要素，其中四个属于人本产权。现在有文件说赋予人本产权，我认为“赋予”二字值得研究，人本产权是人自身的内在属性，不是别人“赋予”的。

第二要义——“多权能”。除所有权外，还有支配权、管理权、使用权等多种权能，特别是海洋用益物权，我曾应邀到台湾访问，他们让我讲“海洋的用益物权”问题。

第三要义—— “四联动”，即四个产权制度联动（下面结合实际操作讲）。

四、 用产权机制减碳的四根制度性支柱：实际运作

1.产权的界定制度。资源环境的产权是谁的，一定要界定清楚，我们现在有些产权不清，包括资源环境方面有些不清楚。要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资产产权”制度，解决产权的界定不清问题。

2.产权的配置制度。解决的是产权结构和协调问题，要优化资源配置。

3.产权交易制度。研究碳达峰、碳中和，就要突出解决两“偿”问题，即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的补偿制度。这里面的要点：一是坚持使用资源付费，谁使用资源谁就要付费，不能无偿使用。另一是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要付费。也是从经济角度、市场角度、产权角度，坚持受益（或受损）补偿的原则。应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还有纵向补偿制度。要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机制，建立市场化的机制，把排放权等都纳入产权交易的行列。

4.产权的保护制度。突出解决各类产权受损和保护不力的问题。

五、最后说一下：“碳达峰”相对易，“碳中和”相对难，但前景广阔

我个人研究这些年，感觉到从产权角度来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2030 年“碳达峰”相对容易一点，但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则很难。

破解“碳中和”难题这四条线中，产权这条线我认为是最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广阔。据有关部门测算，2060 年实现“碳中和”大约需要 136 万亿元的投资，这里面政府投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需要社会资本来投入。另有人估计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0 亿元。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产权交易体系，其中湖北（在武汉）环境产权交易所搞得比较好，我实地考察过，深圳朋友不妨看一看。

世界区块链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金岩石——

浅谈有限开放的双循环市场

尽管智库可以推到若干年前，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五十年前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提出增长的极限，人口、粮食、工业、环境、资源。按照罗马俱乐部当年的报告，现在地球已经毁灭了，因为当时说得很明确，地球容纳的最大容量是 70 亿人，所以提出要走向零增长、零生育。

从 72 年这本书出来，25 年财富总量翻了一倍，又过了 25 年，财富总量又翻了一倍，以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原来罗马俱乐部所担心的工业、农业和环境，现在工业、农业占经济总量的不到 20%，中国不到 40%。我们靠什么在 50 年里突破了增长的极限？未来 25 年财富总量还会再翻一番，这个财富哪儿来的？

首先是七十年代以来完善的全球化市场，这是一个双循环的市场，每个国家都可以按照生产—消费—城市化—证券化四个坐标选择三种定位：中心—外围—边缘化。全球化市场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四种资源在流动。企业在流动，货币在流动，财富在流动，思想在流动。

其次是全球经济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逐步走向了数字社会，成熟国家的经济总量中工农业占比越来越低，占比最低的是美国，农业不到 1%，工业不到 19%，工农业合计占 GDP 不到 20%。

从 1971 年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什么？我们现在讲双循环，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循环，但是全球化是第二个循环。站在全球化的趋势上看，在座各位不管做什么，都逃不过这四大趋势（货币化驱动财富增长、工业化驱动国家盛衰、城市化驱动房地产升值、证券化驱动产业创新），把这四大趋势说明白，最后剩下什么呢？工业化会衰亡，城市化会结束，最后只剩下货币，货币量的增长驱动经济增长、财富增长，货币量的增长通过资产的证券化驱动产业创新。

第一个 25 年，纳斯达克市场引进了芯片，摩尔定律让我们突破了前人的财富。第二个 25 年又是一代人，A 是人工智能，B 是区块链，C 是云计算，D 是大数据，ABCD 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这才有了今天的平台经济。现在我们站在第三个 25 年的起点，这 25 年财富总量还要再翻一倍，财富在哪里？

过去的 50 年分成两代人的努力，第一个 25 年就两个字：上线。第二个 25 年是两个字：上网。未来 25 年，从今天开始：上云。你们记住这个方向，然后我来讲为什么未来 25 年财富还会增长一倍，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变了，修泽讲产权扩大了，其实我们最稀缺的资源是空间，什么叫空间呢？简单来说，一个国家的地理空间不等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空间，一个国家的经济空间，不等于一个国家的财富空间。相信在座各位都听说过“元宇宙”，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元宇宙”跟未来财富的关系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元宇宙”，“元宇宙”就是第三代互联网，你们不要以为是玩游戏。第一代互联网构建了线上社群，第二代互联网构建了线上社群的网络空间，第三代互联网是线上社群的关联虚拟空间正在开发中。第一代我们用电脑，没了电脑我们什么都不能干。第二代我们用手机无线互联，我现在告诉你，十年后，今天坐在这里的人，至少有一半人会戴头显（头部显示器），苹果公司开发的头部显示器计划目标是 2 亿台，将来我们通过头显能看到超越空间的外层空间，而且时间可以逗留，将来我们这些人都不需要坟墓了，我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为先人创造一个活的空间，他永远早晨起来问你“你怎么还没死啊？死了更好啊”。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坟墓、不需要房子，空间超越了时间和技术边界。

从电脑到手机、到头显，今年刚刚开始。于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上线、上网、上云，上云我们就会看到在现在的社群之外还有一个关联的虚拟空间，这个虚拟空间创造的财富总量将逐渐超越现在的空间，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社会，知识数据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现在的中国是长江以北三分之一，长江以南两个三分之一，这两个三分之一，一个是长江以南腹地，一个是长江以南沿海。我画了一条“金岩石曲线”，告诉你未来的中国是“一个中心、两个小湾区”，一个中心是北京，两个小湾区，一个是大深圳，一个是杭州湾。但是在虚拟空间的财富会逐渐超越陆地空间的财富，这就出现了不等式，即财富总量大于经济总量、经济总量大于地理空间。在这样的顺序下，今天的三分之一、三分之

一、三分之一，25 年后你会看到，长江以南沿海占陆地空间不到 10%，但是财富总量会达到半壁江山。深圳就是未来中国最大的财富中心，甚至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这就是空间的三个维度。

深圳市委党校二级巡视员、深圳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谭 刚——

打造区域战略中的高质量发展引擎——基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视角

我今天主要谈谈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引擎平台问题。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跟十九大报告总结的“八个明确”相比，新增加了两个明确，其中一个明确专门提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论断一道，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思想遵循、思想指导和思想保证。不仅如此，《决议》在第七章“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新赶考之路作出“五个必须”的总体部署，其中同样提到“推动高质量发展”，这表明“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任务和工作部署，应贯穿到新赶考之路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在上述基础之上，《决议》对有关高质量发展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论述：一是做出经济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即“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是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对高质量发展做出明确界定，明确提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即“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能够称得上是高质量发展。三是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以来重大部署中的主题，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和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集中对我国发展作出部署，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高质量发展成为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主线，也就是从十八大以后的主题主线这一高度来讲高质量发展。四是《决议》在总结新时代十三项重大成就的经济建设成就时，专门点出区域战略中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包括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的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等。此外，在总结第十二项成就（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时，还特别提到“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跟区域发展、区域重大平台紧密相关，所以我们得出一个推论，即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引擎平台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高质量发展的平台或者引擎。

对于这一推论，我们可以从刘鹤副总理 11 月 24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中得到印证。文章在第三部分“加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明确提出“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从非常权威的角度讲到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高质量打造区域重大平台、重大引擎。

从深圳的角度来观察，无论是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还是在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引擎作用，同样需要打造深圳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引擎或平台。去年 10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参加 40 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广东、深圳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率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随着深圳迎来“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改”示范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不断推进，深圳自身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都需要高质量发展引擎或者平台。

那么应当如何建设高质量发展引擎或者平台呢？参照 9 月 6 日中央正式印发的前海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案所提到的相关要求，我把高质量发展平台总结为提升“三强”能力、发挥“一广”作用，主要包括四个内容：

一是增强资源动员力。增强深圳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调配、调动、配置

等能力，尤其是在产业链、供应链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面临断链、断供问题背景下，增强资源总体动员能力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

二是提升创新策源力。依托深圳近年来夯实打造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金融科技+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增强深圳在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等方面具有重要原创力和强大影响力，力争深圳在全球范围内学术和科学创新有一席之地、技术创新展一技之长、产业创新能一马当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集群排名，近年来深圳+香港（去年新增加了广州）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第二，表明了深圳等城市的创新能力。从最近清华大学等机构作出的排名来看，再考虑到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创新生态等评估因素后，包括深圳、香港、广州等城市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集群排名是第 7 位，客观表明大湾区城市群的综合创新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怎么才能做到策源？总体来说就是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所提出的提升“五力”、打造“五地”。以此为基础，深圳应当着重发展七个战略新兴产业以及 20 个产业集群，这不但涉及到创新链问题，还涉及到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是“双链”融合问题，通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从而提升深圳总体创新策源力。

三是强化协同引领力。总结深圳 40 多年来在区域合作方面的丰富实践和广泛经验，以打造深港双城经济、推动广深双城联动、加快深圳都市圈建设、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融合发展等为动力，不断丰富和拓展深圳与港澳之间、与大湾区各城市之间以及其他区域城市之间的协同协调发展模式，力争实现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进而形成和增强深圳的强大协同发展与带动引领能力。近期大家都在讨论 10 月 6 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北部都会区概念，300 平方公里形成西、中、东“双城三圈”北部都会区确实给我们描绘了大有前途的深港双城关系。从总体上看，香港北部都会区的 300 平方公里，与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之初的特区面积 327.5 平方公里大体相当。目前深圳正在谋划都市核心区，以福田、罗湖、南山三个中心城区，再加上宝安、龙华、龙岗三个区的若干个街道，共同形成未来深圳的都市核心区，估计面积大约也是 300 多平方公里左右。如果把 300 平方公里的香港北部都会区，与 300 多平方公里的深圳都市核心区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大约 600 多平方公里

的“双城三圈、两湾一河”的港深都会区，不但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成为最重要的双子城，在全球范围之内也将是超级城市组合。除深港双城故事之外，另外还有深圳与广州“双城联动、比翼双飞”的城市组合。这种城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就是前海合作区方案提到的协同协调发展模式问题，同样是打造高质量发展平台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是发挥示范推广作用。依托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和前海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等各个领域不断探索、形成成熟做法和鲜活经验，提供给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和全国各地参考、借鉴、复制，从而确保深圳尤其是前海合作区的改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今年 7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总结了深圳改革创新的探索和做法，归纳整理成五个方面、47 条，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借鉴，同时要求深圳进一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协助做好推广借鉴工作。总之，发挥示范推广作用同样是体现高质量发展平台引擎作用的重要表现。

尽管智库可以推到若干年前，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五十年前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提出增长的极限，人口、粮食、工业、环境、资源。按照罗马俱乐部当年的报告，现在地球已经毁灭了，因为当时说得很明确，地球容纳的最大容量是 70 亿人，所以提出要走向零增长、零生育。

《马洪基金会专刊》是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

◇ 读者群为基金会上级领导部门、理事和名誉理事、智库百人会专家学者及其他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 主要内容为重大研讨活动、论坛、沙龙等学术交流中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综述文稿及学者文章。

◇ 稿件来源以马洪基金会及智库百人会的专家智者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4 楼　　邮　编：518029

联系人：林洁漫　　责任编辑：吴泽婷

电　话：0755-82470728　　电　话：0755-82470650

网　址：http://www.szmhf.com　　微信公众号：szmhf01